

# “经济”辨析(下)

冯天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经济”本义“经世济民”。近代日本借用此一汉语旧词对译英文术语 economy,含义变为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兼指节俭、合算。今天我们习用的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既与该词的汉语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词语。而“经济”所指概念的转变,正透露了近代日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摆脱出来的取向。

关键词:经济;经济学;计学;理财学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6)01-0005-07

## 五、近代日本对于译词“经济”的犹疑和替代尝试

综上所述,幕末、明治间日本逐渐普遍地以“经济”对译 economy,“经济”一词脱离了古汉语的固有含义(经世济民),也游离于“经济”一词词形所可能昭示的意义之外。对于此一翻译,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学的物化主义走向,日本也不乏批评者,如日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在《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想》(多贺出版株式会社 1981 年)的序章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

山崎明确指出,日译“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济民”古典义,这不仅是词语的畸变,也意味着经济学说从关切治国平天下的大义,走入追逐物质财富及论证其合理性的道路。

当然,近代日本也并不是立即将 economics 的译名统一为“经济学”的,幕末明初对译词“经济”持犹疑态度者不乏其人。如西周虽在 1862 年的书信中使用过“经济学”一词,1863 年留学荷兰期间交叉使用“制产学”和“经济学”,但他一直不能忘怀“制产学”这一名目。明治三年(1870)西周的讲稿(多年

后由学生整理成《百学连环》刊行)中,遵循中国经典《孟子》的“制民之产”一语,再次阐发“制产学”这一学科名目,并认为以“经济学”翻译 economy,选词并不准确,而“制产学”则较能在古汉语义与西义之间达成沟通。西周在《百学连环》中指出:

近来津田氏有“经济学”译语行世。此语采用“经世济民”的缩语,而专指民生、活计论,则不一定适当,故我采用孟子“制民之产”一语,创“制产学”以译之。

后来,西周于明治七年(1874)刊行的《人世三宝说》中,又在论金钱、富有时使用“经济学”,还在论贮蓄流通时使用“经济学”,这都是正面肯认作为 economics 译词的“经济学”。但在同篇,又有“弥尔氏的利学”一语,将英国学者弥尔(今译穆勒)的经济学称“利学”。可见,直至 19 世纪 70 年代,西周一直在“经济学”与“制产学”、“利学”等词之间徘徊。以“经济学”作 economics 译词,显然不是西周的理想选择。

福泽谕吉是“经济学”译词的创用者之一,如前所述,他早在 1867 年编写的《西洋事情·外编》中便使用“经济学”,1868 年又在其创办的庆应义塾(今名庆应义塾大学)将美国人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 1796—1865)的著作 The Ele-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翻译成《经济学要论》,作为教材。但与此同时,新术语“经济”、“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福泽又多次使用“理财”、“理财略”、“理财方略”、“理财法”、“理财的法”一类词语,以指称生计活动及相关学说(见《福泽谕吉全集》第12卷、第13卷)。其“理财”一词,取自《易经·系辞下》的“理财正辞”,意谓对财富的有利运用。近代日本学者以“理财”名篇的不少,如中村敬宇安政五年(1858)作《论理财》(《敬宇文集》卷之二)。

大约是根据福泽意旨,庆应义塾设“理财科”,明治二十三年(1890),其文学、理财、法律三学科合成大学部,此为庆应大学的基础,而庆应大学的经济学部直至20世纪30年代还称“理财学部”。与之类似,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其经济学部的前身是文学部的理财学科,大正九年(1920)《大学令》颁布后,其“理财科”才被“经济学部”所取代。“理财”一词长时期在日本通用。明治11年(1878),日本大藏省记录局编纂篇幅浩繁的《德川理财会要》,沿用“理财”一词(参见千种义人《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之现代的意义》第279页,关东学园大学平成6年版)。

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编纂的《哲学字汇》第一版(明治十四年),绪言列举该辞典涉及学科名目,未出现“经济学”,而用“理财学”(初版《哲学字汇》井上哲次郎撰《绪言》),将Economics条目译作“家政,理财学”。《哲学字汇》1912年第三版,仍将Political economy并列译作“经济学 理财学”,并在注中引汉籍语“文中子云,是其宗侍,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易系辞云,理财正辞。”

直至当代,日本辞典还有兼论economy的多种汉字译名,如新村出编,岩波书店1998年11月出版的《广辞苑》第五版的“经济学”词条,注明“经济学”是political economy及economics的译语,并对其下定义为“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旧称理财学”。这表明,“理财学”作为过渡性译词,长期在日本流行,直至近年的辞书还要注明经济学曾称“理财学”。

可见,与“经济”近义的译词,如“制产学、利学、富国学、理财学”等,在日本曾长期与“经济学”并用。经济、经济学成为通行的、规范化的术语,日本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19世纪60年代初至90

年代末)。

六、清末中国学人不大认同译词“经济”,而以“富国策、富国学、计学、生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等翻译economy

与幕末、明治间的日本曾产生economy的多种译名一样,清末中国也对该英文词语作过种种翻译尝试,而且比日本的译名更加纷纭多歧。

清末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年代末设立经济学课程,主讲者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P 1827—1916),他将课目定名为“富国策”(袭用宋人李觏《富国策》的篇名,而李觏的篇名之词干,又取自《荀子》的《富国》篇),以英国人福塞特(H·Fawcett 又译法思德 1833—1884)1863年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作教材底本,该书后由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汉译、丁韪良鉴定,书名《富国策》,同文馆1882年印行。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在《万国公报》载《强国利民略论》,议及“强国若何,利民若何”,提到《大学》的“理财必先以格致”之说。后来传教士以“理财”表述Economy自此始。

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Fryer·John 1839—1928)1885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自由主义经济著作Political 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书中将“经济学”表述为“佐治之学”、“理财之律学”,又音译作“伊哥挪米”。

1886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Edkins·Joseph 1823—1905)将英国人威廉·杰文斯(W·S·Jevons 1835—1882)1878年印行的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版(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先在《万国公报》第43—88册连载(光绪十八年闰六月至二十二年四月),后由海关总税务司出版单行本,该书将Economy译为“富国养民学”,称经济学家为“富国养民家”,均由“富国养民策”推衍而来。该书还使用“分工”、“资本”、“流行不息资本”(流动资本)、“定而不移之资本”(固定资本)、“利银”(利润)等汉字经济学术语。

陈炽(?—1899)1896年著《续富国策》,宣称承袭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于时人将《国富

论》讹称《富国策》，故陈炽将自己意在追迹亚当·斯密的论著命名为《续富国策》，并宣称其书是要“踵英而起”，促成中国富裕。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二月，马林、李玉书在《万国公报》连载《各家富国策辨》，评介欧美各种经济学说。同年十二月《万国公报》载广学会、益智会《推广实学条例》，陈列“华文西学”课程单，内有“富国策”一目。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入华西洋人及中国仿效者曾用“富国策”、“富国学”、“佐治之学”、“理财之律学”、“理财学”、“伊哥挪米”等多种名目翻译 economy 及 economics。清朝学部审定，将 economics 的译名定作“富国学”。中国学者探求此一名目的，始于梁启超和严复。

直至 19 世纪末叶，中国士人仍然多在“经世济民”义上使用“经济”，连乐用新名词的康有为也如此，他的《日本书目志》卷五“政治门”中，有“凡六经皆经济之书”的议论；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北京建立“经济学会”。这两处出现的“经济”一词，仍取经世济民古义。

梁启超（1873—1929）1896 年首先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介绍“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他该年在《时务报》第 14 册刊发的文章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次年梁启超撰《变法通议·论译书》，在“富国学之书”下加注“日本名为经济书”。可见，赴日之前的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学、经济学”，而以资生学、理财学为主词，以经济学作辅助性的比照名称。

亡命日本以后的梁启超，开始正面使用日本译词“经济”。1899 年梁氏在日本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称：

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

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这时的梁氏对日本人将 economy 译作经济，已开始采纳，却又并不完全认同，他推崇的还是“资生”一词。

1900 年，梁氏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引述日本人翻译马克思（其时译名为“麦喀士”）的言论——

“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这是在新义上用“经济”一词。而 1902 年 2 月，梁氏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言及，亚当·斯密开创了近代新的经济学说，文曰：“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这里使用“生计学”，回避“经济学”一词。可见，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徘徊于日译词“经济”和自译词“生计”之间。

严复（1854—1921）对日本译词“经济”采取更为鲜明的保留态度。1899 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初拟译名《计学》，该年二月完成一册，寄吴汝纶阅，吴答严曰：“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驯，又得实，吾无间然。”（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民国丛书》第三编，77，上海书店，第 41 页）可见，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十分赞赏译名“计学”，以为既雅且实。严复根据亚当·斯密原著书名本义，后来于 1901 年成时，将译名定为《原富》，他认为这是亚当·斯密十余种论著中“最善”之作，他在《斯密亚丹传》中说：斯密“归里杜门十年，而《原富》行于世。书出，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这里的“言计之家”相当于今语“经济学家”。

严复译毕《原富》，并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 economy 译作“经济”失之笼统（“太廓”），不妥，主张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

又解释何以将书名定为《原富》：“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利所由出云尔。”

严氏还在 1902 年与梁启超的通信《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谈及“计学”一词的来源：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 Economics 字祖义着

想,……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

可见严氏创“计学”这一译词,是颇费心思的,认为它既昭显了“计”字包蕴“国计、家计、生计”诸义,又切合英文 economics 的“祖义”,故他对译词“计学”相当自信。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汉英对译的原则:兼顾汉英双方传统词义(祖义),选择与原名内涵相符的汉字词作译词,从而达成两种语文的通约。严复的“计学”一词虽未获流传,但他提出的翻译原则却是正确的,百年之后读来,仍令人心服,此诚先哲之至论,后人不该遗忘!

同一时期,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自己的作品命名《计学平议》,可视作对严复创“计学”一词的响应。

梁启超基本赞同严复的“计学”译名,梁氏1902年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便是在严译“计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他在该小史的“例言七则”中说:

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本编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后人。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982页)

梁氏这番话透露了他曾以“平准”译 economy,但不满意,又选“生计学”,仍属姑且用之,并寄望于来者“悉心商榷”。这既说明一门学科初创时的定名不易,亦显示梁氏在术语厘定上的虚怀若谷态度。

关于严复等中国学者不认同日本以“经济学”对译 economics 的原因,笔者略作如下推测:日本以“经济学”对译 economics,发生在幕末明初,即19世纪60、70年代,其时欧洲还处在“政治经济学”盛行的时代,日本人自然以“经邦济国”义的“经济”对译之。而严复正式展开翻译事业,在19、20世纪之交,其时欧洲已发生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转变, economics 限于讨论国计民生问题,故严复认为以“经济”译之“太廓”,从而选用“计学”之类译词。但严氏自己并未直接指出上述意思,这只是笔者的一种分析,聊备一格,提出来供参考。

总之,严氏、梁氏等清民之际的中国学者一直

不大认同以“经济学”对译 economics 这一学科名词,而力图从古汉语中寻找意义与 economics 较为相近的词。除计学、生计学外,时人还一度起用“平准学”,其中的“平准”一词,取之汉代实行的“平准法”,《史记·平准书》有具体记述。平准法意在保护小农免受巨商垄断之害,朝廷在市场物价低时购进生活用品,市场价格上涨时以优惠价售出,以保障平民生活。“平准”一词后来从平抑物价之义引伸为财政政策,接近今义“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上述努力在辞书中也有表现。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对计学下定义:

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

这里以“计学”为条目主称,而以经济学、理财学作辅佐性说明词,没有以“经济学”设立词目。

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胡以鲁(?—1915),1914年撰《论译名》(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天津《庸报》第26、27期合刊),对日本新名词入华从总体上给予肯定,也指出有些译词含义不通,认为“不宜袭用,防淆乱也。”其中“亟宜改作”的日本译名,胡氏特举“经济”、“场合”、“治外法权”等例。可见,认为日译词“经济”“不合吾国语法”,“不宜袭用”,是清末民初中国学人的普遍看法。

七、民初因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影响及孙中山提倡, economy 的译词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 economics 在中国的译名,音译、意译并用,呈现一词数译的多元局面。音译如严复译《原富》中的“叶科诺密”,还有“爱康诺米”、“伊康老米”等等。意译有新教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富国养民策、理财之律学,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学、轻重学、理财学、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等等,众词并用,莫衷一是。这些译词多选自古典,“平准”、“富国”前述不赘。又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计上》)。可见“理财”是古汉语中表述经理财政的通用词,以之对译 economy,庶几切近。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中将经济学阐释为“《大学》理财之事”,将经济学家称之为“理财之学者”。

20世纪初,economy的译名由众词纷然终于定格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劲影响有关。1901年由留日学生纂集的《译书汇编》中发表《经济学史》一文,即采用日本译词“经济学”。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宣讲“经济学”,使今义“经济”和“经济学”开始得以普及。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905年王璟芳译日人山崎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崎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清末翻译西洋经济学论著,也借用日本译词定名,如1908年朱宝绶译麦克文(S. M. Macvane)著作,题《经济原论》;1910年熊高熙等译R. Tely的书,题《经济学概论》。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通行有别,“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包括梁启超、严复等学界巨子在内的不少中国士人,曾一再试探找寻与economics相对应的、含义较确切的汉字词,故“经济学”长期与“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生计学”并列使用。如前所述,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周等,虽然也使用“经济学”一词,却又并不满意,福泽谕吉欣赏“理财学”,西周更钟爱“制产学”。这都反衬出以“经济”对译economy,并不理想,汉字文化圈内中日两国的顶级学者都试图另寻译词。

“经济学”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成为通用术语,除清末民初日籍(尤其是日本教科书)流行造成的影响外,还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文化宣传实践颇有干系。在日本编辑出版的革命派报纸《民报》多用日译词“经济”。孙中山(1866—1925)、朱执信(1885—1920)等人文章常在今义上使用“经济”。民国初年,孙中山还专门提倡“经济”一词,力主以此取代“富国策”、“理财学”之类。孙氏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

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学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

似稍近之。经济学之概说,千端万绪,分类周详,要不外乎生产、分配二事。生产即物产及人工制品,而分配者,即以所产之物,支配而供人之需也。

1912年10月,孙氏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也讲过类似的话,并在演说中一再出现“经济学”、“经济学家”、“经济主义”、“经济学之原理”等语。

民初以后,经济、经济学逐渐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在民国年间还延续了一个时段,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882—1982)1914年在耶鲁大学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普遍接受并获通用。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等。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889—1927)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述他从日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的“经济学”当然是采用的日本译词。

八、今义“经济”的语义学考察:在古今义转换、中西义对接间错位

今义“经济”(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兼指节省、合算),已经约定俗成,不仅学界通行,而且民间习用,大概是难以更换的了。然而,“经济”所负荷的今义从语义学及构词法考究,存在明显弊病,却是应当予以揭示的。

由于汉字的歧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包蕴多种含义,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常常发生含义的扩大、缩小、引申甚至全变,这是汉字古典词能够演化为新语的条件。不过,这种扩、缩、引申、全变,应当遵循汉语文词演变的逻辑,人们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或在使用中理解。

常见的汉字旧词生新义的方法是,以原词的古义为出发点,令其外延缩扩,内涵转化。如“教授”,原为动词,意谓传授知识;宋代以降,成为偏正结构名词,指掌管学校课试的学官。“教授”的今义是在翻译professor时获得的,特指大学教师中的最高职

称,但此一新义是原义的合理引申。再如“物理”,古义泛指事物之理,今义是在翻译 physics 时获得的,收缩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门类,研究分子以上层面的物质变化规律(分子发生变化,则是化学研究的领域),此一内涵演变也有逻辑可循。又如“历史”,古义为史书,指过往事实的记述,今义是在翻译 history 时获得的,转化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指历史学科,此种引申,易于理解。“组织”的古义是纺织,今义是在翻译 sosiki 时获得的,转化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进而引申为社会中按某种任务和系统结合成的集体(organization),古今义变化甚大,但今义可从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内寻觅。总之,这些汉字词的古今义之间虽然有泛与专、宽与窄的区别,或者所指发生了变化,但其新旧词义间保持着遗传与变异之间的内在张力,因而使用者稍运神思,便可发现二者间的演变轨迹,对词义的古今推衍、中西对接,有所会心。

反观“经济”一词,其今义不仅与古典义脱钩,而且无法从词形推衍出来,即使改变构词法,也不能引出今义。今义(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总和,以及节省、合算)是外加给“经济”这一汉字词的,因此,新术语“经济”失去作为汉字词的构词理据。这正是中国学者严复、梁启超、胡以鲁、马寅初等不愿意认同此一译词的原因,而试图以“计学”等词取代;日本学者西周则创“制产学”以更替“经济学”,福泽谕吉虽是译词“经济学”的最早制造者之一,但他也并不满意该译词,而更倾心于“理财学”,其内在原因也在于此。

九、今义“经济”的历史学考察:国计民生问题与政治、伦理相分离,社会进步的经济尺度的突现

然而,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中两国还是先后选择了“经济学”作 economics 的译词,其间的原因,须从历史学角度观察,方能获得真解。

综观除“经济学”以外的近代中日两国创制的 economics 各种译词,如“计学、生计学、平准学、资生学、轻重学、理财学、富国学、制产学”等等,有着类似的性状:都以某汉语古典词(如“计、平准、资生、轻重、理财、富国、制产”等)作基轴,并以其古典义为出发点引申出新义,故词形与词义是统一的,可以观形索义,因而具有较充分的汉字词构词理据。但是,何以它们都未能占据 economics 译词的正宗地位呢?笔者以为,这些词虽然有着充分的构词理

据,却全都存在一个相似的弱点:分别只表达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足以概括全貌。严复在《原富》的《译事例言》中说:作为 economics 的译词,“理财又为过狭”。平心而论,严复此一批评,不仅适用“理财学”一词,其实是切中了上述诸词(包括严复自创的“计学”在内)共通的要害:它们所彰显的意义,或为生产、或为消费、或为分配、或为管理,而无力总括人类物质生活的整体,故均难以充作 economics 的理想译词。唯独“经济”及“经济学”,虽然被严复责备“既嫌太廓”(含义太泛),但毕竟更富于统合力,终被历史勉为选中作 economics 的译词。

本文前面已详述,译词“经济学”存在概念古今错位、词形与词义相脱节的缺陷,并非一个合理的汉字术语,对学科的发展带来某种不便,如在追溯此学科的学术史时,古典概念与今之概念,东方概念与西方概念间,便多有隔膜,须化费颇大气力作阐释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曾著《“中国经济学”寻根》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四期),对此一问题作辨析。

如果变换角度,将语义的变迁置于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发现:近人以“经济”翻译 economy,使“经济”从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政治、伦理“大义”中解脱出来,赋予物质财富的创造、交换、分配等意义(节俭也在此意之中),这样,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此一头等重要的实际问题,其研讨的重心,便由“义”转为“利”。这正昭显了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社会的价值取向从古典的“轻利重义”演变为近代的实利主义。

近代工业文明有多重精神支柱,实利主义为其重要支柱之一。利益驱动、价值法则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推进近代工业文明的强大动力。正是这种近代工业文明令实利主义大为张扬的历史实际,使得作为国计民生之学的 economics 在近代西方创生并逐渐摆脱对政治的附属地位。economics 作为这样的一种近代学科,18、19世纪成长于欧美,进而播扬世界,就东亚而言,日本率先于19世纪中叶开始建立此一学科,这与其“开国”并向工业文明迈进大体同步。被称之为“东洋卢梭”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对经济的近代意义有敏锐的观察,他1888年指出:“19世纪以前,经济曾是政治的附属品,但这种附属品变为了必需品。”(《东云新闻》,明治21年,

10月4日)“经济”一词的含义在近代日本发生变更,从中江兆民的这番话中可以悟出个中原由。

中国约于19世纪末以日本为中介开始传入西方的近代经济学,同期严复直接从欧洲译介此学,但如前所述,在清末尚未形成统一的术语。至20世纪初(民国初年,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之际),近代经济学正式流播中国,而“经济”含义的古今转换,“经济学”成为国计民生之学的共名,正是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严、梁等近代中国学人从语义学的纯正角度,不满于译词“经济”,而试图另拟别语作为economy的译词,但中国人终于从民国初年开始接纳“经济”这一译词。表面上看,此为日本新名词强劲影响及孙中山倡导的结果,但究其实质,却有一种时代趋势在起作用:中古式的泛政治、泛伦理的“经世济民”之类意义,已不敷需用,而英语economy所包含的“国民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之总和”的意义,更能反映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总体状貌,人们无以

名之,只得从古典词里寻出“经济”以称呼。当然,人们为此支付了放弃词语纯正性的重大代价。

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反思,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当年如果能创制更加确切、形意相应的汉字术语以表述economy所包蕴的新概念,或许会有助于人们观词索义,从而便利大众理解,促进相关学科的成长。不过,语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理会“如果”。它的实际运行过程表明,在新概念纷至沓来之际,似乎无法十分从容地字斟句酌,有时还会放弃对构词理据的坚守,只顾在大众的语文实践中浩荡前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反思的无益,因为,去者不可追,来者犹可为,我们所应当做,也能够做的工作是——

揭示已成术语的演化过程,辨析其间的成败得失,以增进今后接纳新概念、创制新术语的理性自觉,使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的建设,步入较为健康的轨道,为发展中的知识网络提供坚实可靠的纽结。(续完)

(责任编辑:卢圣泉)

## A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y

FENG Tian-yu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Economy means helping people by administering affairs originally. In modern times Japan translated the English terms of economy by borrowing this old term from Chinese, which means the summ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e word of economy with the new meaning is neither the same from its classic meaning in Chinese, nor can it be deducted its present meaning from its morphology. It is a term which is involved with unsuitable wa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to Japanese. The conversion of concept of economy reveals the recognition of social livelihood of Japanese in modern times and Chinese subsequently the orientation rid from the concept of pan politics and pan morality.

**Key words:** economy; economics; characteristics